

# 第一章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及其认识发展史

历史地理学作为边缘学科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它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他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历史地理学作为科学的研究的对象，因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地位而具有一定难度。问题在于历史学家、自然地理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们均把它视为“自己的”学科，并以相应的方式规定了它的对象、任务和发展前景。还应该指出，母体科学的成功或失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历史地理学的进步。十月革命之前，在历史地理学的内容方面长期存在着模糊不清的问题。对此，这一科学领域的著名专家B. K. 雅尊斯基引用了C. K. 库兹涅佐夫的如下一段话：“如果我认为目前所叙述的这门科学——俄国历史地理学（指的是教科书——本书作者）的内容是极不明确的，历史地理学概念的本身是极其模糊的，未必是我弄错了”。<sup>[1]</sup>毫无疑问，为了弄清楚有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B. K. 雅尊斯基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尤其是关于这一学科的对象、任务和在其它学科中的地位问题有时仍然被提上学术讲坛，作为辩论的课题。<sup>[2]</sup>

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地理科学的进步，地理学任务的某种改变迫使人们以新的方式去看待历史地理学。当然，现阶段地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性。而这一任务，“在过去时代是被推翻了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永远是摆在历史地理学面前的任务。

## § 1 历史科学代表人物对历史地理学的对象所下的定义

历史学家比地理学家更早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必须结合社会的历史来研究自然界的历史”，这不是偶然的。17—18世纪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地理学家，因此在历史著作中常常含有森林面积、冲沟形成、沙地吹蚀和其他自然现象的资料。当然，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问题的提出本身无疑是有价值的，因为从现代观点来理解，可以将这种作法视为历史地理学产生的一定前提条件。

历史学家较之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个优势，即他们掌握大量与其他材料一起阐明自然界历史变化问题的实际材料。除此之外，把历史事件与地理环境的特征联系起来的思想总是令人神往的。的确，这常常导致远离科学真理的决定论者的理论体系的产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现在，重要的是要强调，历史学家对景观和自然环境的兴趣一般来说不是偶然的——这种兴趣由于需要解释新发现的历史事实而持久不衰。

俄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是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的 B. H. 塔基谢夫（1686—1750）。他在自己的著作《关于撰写俄国的历史和地理的建议》中写到：“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尽管从字面上给我们作了明确介绍，但是事件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有哪些自然条件妨碍和促进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哪个民族从前在什么地方生聚，现在又在什么地方生聚；现在还有哪些古代城市，其在历史上是如何转移的；这些问题只有地理学和已编绘的地图才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而历史学，或者口头史和编年史离开了地理学就不能给我们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sup>(3)</sup>因此，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其他任务的同时，还有研究影响经济生活发展的自然因素（“若干障碍物”）的任务。B. H.

塔基谢夫在其著名的《辞典》(1793)中更详尽地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历史地理学或者政治地理学记述疆域和地势、地名、国界、民族、人口迁移、建筑或村落、治理状况、暴力、富足和穷困，并且将上述对象分作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或者现代的”。<sup>(4)</sup>在这一定义中没有指出自然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但是强调了历史地理学和当代地理学相联系的思想。

必须指出，B. H. 塔基谢夫作为传统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学流派的奠基人，指出了“透彻”分析实际材料的必要性。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对于地理学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复原现代地理学对象的历史。

M. B. 罗蒙诺索夫曾指出了历史地理学和当代地理学之间的相互联系。他在《论地层》(1763)这一著作中着重写到：“因此，首先应该正确无误地记住，地球上看得见的一切实物和整个地球不可能从形成之初起就象如今所见到的那样，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上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地理证明了这一点”。<sup>(5)</sup>这样一来，M. B. 罗蒙诺索夫就强调了当代历史地理研究所特有的历代性方法的意义。

Л. 迈科夫第一个详细地叙述了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按照他的意见，“历史地理学不可避免地要超出单纯描述的范围；它在运用普通自然地理学的各种资料时，应该指出自然界对整个人类或者对某些民族的影响。历史地理学必须探索在某一国家中该国的一般地理条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条件在这个国家又以何种程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或者是阻碍了民族的文明成就。同时，历史地理学还应该描述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及其形式，即人类使周围有机体及无机体进入文明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最后，了解这种斗争对于居民产生的结果”。<sup>(6)</sup>迈科夫在著作中引用了俄罗斯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变化的资料。他认为：“只引用历史文献不能证实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区古代森林植被特别茂盛”。<sup>(7)</sup>这一看法，无疑十分重要。必须强调指出，学者们有这

样的意图，即他们把历史地理学看作是关于社会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尤其是将自然科学问题列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这种作法是值得重视的。

M. K. 柳巴夫斯基认为迈科夫关于历史地理学任务的定义是非常“漂亮的”，同时也是“完美的”。他在自己的俄国历史地理学教程中把研究人口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组成和工业布局等看作是本学科的任务。他所进行的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与移民拓荒史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是这一学科的任务。书中还详细地叙述了森林和草原相互关系的问题。<sup>(8)</sup>

C. M. 谢列多宁也象J. 迈科夫那样，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以往历史时期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在其俄罗斯历史地理学教程中，他给这一学科的任务下了一个更狭隘的定义：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首先是东欧平原地区各斯拉夫部落的分布，然后是罗斯民族的形成，最后是罗斯民族移民拓荒运动及分解为几个部族。历史地理学还要确定俄罗斯国家在其存在的各个不同时期（9世纪、10世纪、11世纪及以后的罗斯）的疆界，以及国家各组成部分（邦、州、公国、省、县）的界线，指出具有历史意义并在文献资料中提及的居民点位置。同样，还有各种交通要道（移民拓荒道路、工商航路和行军道路）的走向。最后，历史地理学还要研究罗斯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势必接触到的其他民族（芬兰人、突厥人、立陶宛人等）。而且历史地理学当然要更详细地谈到那些没有自己历史的部族（贝琴涅戈人、波洛韦茨人、维锡人、摩尔达维亚人、乌戈尔人；但不是瑞典人、日尔曼人、希腊人、波兰人）；其次，历史地理学研究俄罗斯人生活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sup>(9)</sup> C. M. 谢列多宁所下的这个定义，十分完备地表述了历史地理学中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所理解的这门科学的种种问题。

A. A. 斯皮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复原一个广阔的背景；而这一背景“对于弄清事件发生的进程和历史现象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研究民族的迁移必须“与其占有地区

的环境特征紧密地联系起来,”<sup>〔10〕</sup>历史地理学家不仅在历史学方面，而且在自然科学、语文学、特别在地理学和考古学方面应该成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A. A. 斯皮岑还特别强调了历史地理学的辅助作用，因为这门科学研究“事件和现象的地域特征（确定国家和省区界线、居民点及交通要道等）。”其教程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理概况。在这里作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移民拓荒的路线、行政组织机构、一个个的历史事件；而全然没有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复原广阔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必要性的论述。

所列举的上述定义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一个共同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普遍赞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了自然科学方面。但与此同时，在研究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中，决定论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在以C. M. 索洛维约夫为创始人的“俄罗斯人口漂泊理论”中，这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国家的起源》（1900）和《远古以来的俄国史》<sup>〔11〕</sup>这两部著作中十分起劲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国家造就了俄国人对迁移、“漂泊”的向往。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已充分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毫无根据。在本书的后面几章中将列举材料来证明诺夫哥罗德地区农村人口所具有的很大稳定性。

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非常注重地理学问题。在这方面，B.O. 克柳切夫斯基著名的《俄国史教程》的结构是令人感兴趣的。教程的最初几讲阐述了俄罗斯的自然条件（地形、地质基础、土壤等）的特点。在教程的专门章节中叙述了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人对诸如冲沟形成和沙地吹蚀这样一些自然过程的作用。<sup>〔12〕</sup>克柳切夫斯基分析了作为历史过程发展条件的俄罗斯自然环境特征，而且他还把俄罗斯平原中部（“阿拉翁—莫斯科地区”）的多种多样的土壤和植被类型，复杂的水路网，以及“植物带和水道枢纽”的出现看作有利的因素。他认为各种各样的自然条

件对人来说，“给以刺激和提供食物”，并且“启迪了人的内在力量”。这位俄国大历史学家的这类观点与唯物主义科学并不矛盾，特别是在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同时，B.O.克柳切夫斯基却过份夸大了自然界对人的心理影响。这位学者在谈到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时，认为自然界“在显然简单而单调的情况下具有缺乏稳定性特点，因为它比较容易失去平衡”。<sup>(13)</sup>冲沟和流动沙地的出现就是“人类缺乏远见”的结果。

这样一来，B.O.克柳切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对历史地理学来说十分重要的见解，而主要的是他列举了某些有关自然环境对历史过程影响的实际材料。

IO. 戈季耶在描述莫斯科周围地区的时候，注意到气候特点、森林分布，并说明了地形和水文地理学的特征。他还强调指出了自然环境和居民经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sup>(14)</sup>

著名的俄国历史经济学家M.B.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用他的专著中的一整章来概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其中自然地理要素：地理形势、气候、地形、土壤、植被占有很大的篇幅。对自然环境的分析使他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俄罗斯的历史生活是在本国自然地理结构不利的外界条件下发展的。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国家很大，但并不富饶”。<sup>(15)</sup>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饶有趣味的是，M.B.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反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俄国农民过着游牧生活的看法。

俄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Д.И.里希特进行了有趣的“按照自然和经济特征将俄国欧洲部分划分为若干地区的尝试”。其中土壤、经营用地、人口密度和居民的就业状况是区划的根据。他特别注重经营用地，因为在这些土地上，“无论自然环境对居民的影响，还是人们获得自然资源和利用本国自然条件的方式，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如此明显地显露出来。”<sup>(16)</sup>区划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是因为它用数量表示法（关于耕地、森林、草场、贫瘠地、人口的资料）来说明区域的开发率。

因此，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地理学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向：将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列入本学科，以及把地理环境看作各种社会经济事件的背景。把对自然界的评述列入本学科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作法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前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遵循历史过程发展的多种因素，然而主要的经济因素却往往退居次要地位。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整个历史科学和它的一个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按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牢固地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苏联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中，B.K.雅尊斯基的著作（1955，1957）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给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提出了如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学应以历史科学中所采用的分期法为基础，根据与此分期相适应的时间断面，对本国或本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给以描述。”<sup>〔17〕</sup>在其他学者之后，B.K.雅尊斯基也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提出了广义的定义和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关于人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历史地理学的特征包括下列问题：1.该时代的自然地理景观；2.人口的种族构成、区域分布和迁移；3.生产分布和经济网络地理；4.疆域政区地理以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地理。

B.K.雅尊斯基还从历史时期自然界缓慢变化的不确切论题出发，简化了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以往历史时期的人口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变化。”<sup>〔18〕</sup>与前辈们不同，他在自己的具体著作中，不去研究人影响自然界的问题，也未充分地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问题。

B.K.雅尊斯基确定历史地理学的科学意义如下：“历史地理学可以确定历史过程的具体空间，从而促进我们对于历史过程许多方面的认识理论化和深化；还使得我们能够洞察和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一系列地方性特征。”<sup>〔19〕</sup>这个实质上没有引起任何异议的论题给

历史地理学帮了个倒忙。结果人们就把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经济事件从空间上加以限制的所有著作都归之于历史地理学。譬如，在И.П.沙斯科尔斯基详细的综合性报告中，把关于城市地形和东欧土地耕作技术的著作，关于诺夫哥罗德人在“伊格纳奇克列斯特”地区作战的著作，关于十六世纪俄国粮价变动和粮价区域差异的著作，关于森林覆盖率和商业贸易研究的著作等，统统列入历史地理学。<sup>(20)</sup>自然，作者未能提及更多的学者，因为这些学者的著作与前述著作相比，尽管根据历史地理学任务的传统观点在更大程度上均可列入这门学科的范围；但是，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每一个考古学家或农业史学家把所获得的科学资料限定在地图上，正如地名学家、统计学家及许多与研究历史资料相联系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所进行的工作一样。

И.П.沙斯科尔斯基一方面补充B.K.雅尊斯基的历史地理科学的分类，使之更加明确。同时，把历史地理学划分为如下分支学科：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口地理学、历史种族地理学、城市与乡村历史地理学、城市历史地形测量学、历史经济地理学、历史政治地理学。<sup>(21)</sup>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过去时代的自然地理景观及其在历史时期内的变化，以及该国家、该地区发展的每个阶段自然条件对历史地理和政治地理的影响等。”<sup>(22)</sup>

总体说来，这样确定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任务并未引起反对意见。但是作者本人怀疑是否应该把这一学科列入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历史地理学，却是另一回事了。Л.А.戈利登贝格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历史学家不具备研究历史景观问题的条件。他并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地理学这一门研究以往时代的整个地理的历史学科的链环上，自然地理学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对过去时代的具体地理的整个研究不可能是人文系统的科学——历史地理学的目标”。<sup>(23)</sup>诚然，戈利登贝格认为可以把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的目的。

这样一来，Л.А.戈利登贝格以整个推理的全过程把历史自然

地理学问题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定义中排除出来，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上人类和自然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历史经济（人口和经济）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的历史科学”。<sup>[24]</sup>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地理学是处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地位的统一的社会地理科学（即是“地理学的”，又是“历史学的”）。地理学的历史问题也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注意到在学科对象的定义与根据Л.А. 戈利登贝格的意见列入历史地理学探讨范围的那些具体研究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地方。

Л.Г. 别斯克罗夫内与Л.А. 戈利登贝格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指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桥梁之后，进一步写到：“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家的任务主要地是研究历史自然地理（自然环境及其在人类活动作用下的变化）和地理发现的历史；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sup>[25]</sup>的确，Л.Г. 别斯克罗夫内强调指出这种按不同知识划清界限的做法是有条件的。很明显，不是专家的知识，而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具体任务影响着科学界地理学流派和历史学流派的形成。

М.И. 别洛夫试图运用地理环境的概念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地理学作为社会地理学学科是在科学联系的两个领域——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学运用历史学中采用的分期方法，从时空的变化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sup>[26]</sup>作者强调指出，地理环境比自然环境要狭窄，但在它包含生产活动的结果方面却比自然环境要丰富”。<sup>[27]</sup>别洛夫在1976年发表的著作中直截了当地讲到，历史地理环境是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对象。历史地理学同样地又由一系列科学学科组成，其中也包括地理发现史。<sup>[28]</sup>

А.В. 穆拉维约夫和В.В. 萨马尔金发表了相近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把除自然环境以外的生产力和物资技术基础均列入了地理环境的概念之中。<sup>[29]</sup>

近来，地理学家并不乐意使用地理环境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却被哲学家、历史学家所广泛地运用。因此，放弃这个概念尚为时过早。在作者的文献中，关于这个概念的内容曾进行过辩论，其目的主要在于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应该把人口及其经济活动的结果纳入地理环境中。大多数地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C.B.卡列斯尼克说得有道理：“把社会纳入地理环境的概念是不必要的，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环境和周围事物的统一是在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将一个事物纳入另外一个事物之中的途径”。按照他的意见，“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有最直接联系”的一部分自然环境，未被人触动过的景观壳的天然组成部分，以及被改变了但“保持了与原始自然界类型相似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组成部分，均包括在地理环境的概念中。<sup>(30)</sup>对此还应该补充一点，即在地理环境的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被改变了的，具有与原始自然界中类型相似的天然组成部分，而且还应该包括被改变了的已经不具有这种类似物的综合体。伴随着20世纪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大量人为生成物（坑洞、废石堆、水库等），它们均已成为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当然，地理环境的“人文化”过程今后将继续下去。显然，以往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的性质与现在是不同的。

在由作者集体编写的苏联历史地理学教学参考书中，历史地理科学被确定为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自然界和人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对自然界的利用<sup>(31)</sup>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一个部门。但应该注意到解释学科任务时所存在的某些模糊之处。在后来的叙述中，上述任务解释得并不充分。例如，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被改造了的”自然界的特征等均未被揭示。在B.B.萨马尔金的参考书中强调指出了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学的依赖、缺乏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辅助性质。<sup>(32)</sup>

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主要在研究与确定历史事件的地域相联

系的人文问题时，才起着辅助的作用；通常并不太注意历史过程中的地理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的特点）的作用。而B.A.雷巴科夫院士正确地指出，“脱离地理因素就是偏离了现实主义，就是在影响社会发展的地理环境之外研究社会。我们深入历史时代越久远，考虑地理因素就越重要。”<sup>(33)</sup> B.T.帕舒托在强调考虑地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的同时，特别提到了古代俄国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歉收年份。<sup>(34)</sup>

从上述的事实来看，IO.A.基齐洛夫、A.B.杜洛夫、A.Y.杰格佳廖夫的著作就特别值得注意。他们的著作试图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IO.A.基齐洛夫正确地强调了俄罗斯平原有利的自然条件在主要农业中心（特鲁布契夫斯克、斯塔罗杜布、斯摩棱斯克、勃良斯克、苏兹达尔等城市）形成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在诺夫哥罗德地区虽然有着能维持高度密集人口的“辽阔土地”，而这些地方只是在伊尔门湖附近地区的北部和西北部，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伊尔门湖南部附近地区、舍朗河和姆沙加河流域，以及奥尔多维克高原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并不比IO.K.基齐洛夫提出的上述地区逊色，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这些地区。<sup>(35)</sup>作者关于村落不会座落在分水界上的论点也没有实际材料加以佐证。A.B.杜洛夫的论文具有概述的性质，主要以文献资料为根据，很少利用地理方面公布的资料。作者虽然支持他们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时所作的努力，但仍然需要指出，在其著作中人和自然界常常是作为抽象概念出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民族，以不同方式同由于内因作用而变化着的自然体系相互作用着。<sup>(36)</sup>研究不同阶段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分异，是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因为它需要学科间的相互协调。在这方面，A.Y.杰格佳廖夫的著作因具体地分析了村落分布和“土壤地理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引起了极大兴趣。<sup>(37)</sup>

可见，苏联历史教科书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因素的作用问题没有充分阐述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具体研究。<sup>(38)</sup>

科学权威B.K.雅尊斯基的作用对确定历史地理学在各种不同的参考书和百科全书等出版物中所列的任务和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简明地理学百科辞典》(莫斯科, 1961)中, 历史地理学被看作是“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过去时代的具体地理的历史学科。”在《地理名词百科辞典》(莫斯科, 1968)中有更加详细的定义。根据上述两部辞典,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过去时代的地理和地理问题, 也就是说, 它是历史知识的一个部门。历史地理学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口地理学、历史经济地理学、历史政治地理学。

整体来说, 可以肯定, 在多数情况下, 历史学家把历史地理学看作历史知识的一个部门; 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人文问题上, 而对以往时代的具体地理研究很少涉及自然地理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多种相互联系的学科的一个体系。把历史上的地理环境看作学科研究的基本对象, 这种作法值得重视。尽管它一方面要求具体化, 而另一方面, 因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地理环境的(是历史的, 又是地理的), 所以做起来又有某些困难。我们把强调整体地研究该时期和该具体区域的经济、人口、自然环境的系统结构的作用看作是运用历史地理学概念的意义。尽管在历史地理学对象的定义中强调指出了它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地位, 但并未发现实际“引入”现代地理学; 同样, 也没有对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典型的自然环境作评述。因此, 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历史上相互作用的重大问题仍然是一个探讨得很不够的问题。

最后, 我们来简要地谈一谈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发现及旅行史的相互关系问题。毫无疑问, 这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部门, 而且地理发现和地理旅行属于地理学史。当然, 不能由此得出历史地理学家不应该运用旅行资料的结论。相反, 除了书面文献资料外, 旅行资料(日记、笔记、地图)也可以提供国土开发过程的客观评价。P.Л.尤加在研究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及其变迁的问题时, 极力主张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史存在着密切的和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一观点,<sup>[39]</sup>是可以同意的。但是, 除上述看法外, 还存在另一种看法。例如,

Л.А.戈利登贝格（1971）与М.И.别洛夫（1974）认为，地理发现和旅行史不仅应该列入地理学史，而且应该列入历史地理学。

## § 2 地理科学代表人物对历史地理学的对象所下的定义

在18世纪，历史学家同时又是地理学家。到19世纪末，科学的分工导致了知识部门的分化。这一分工也涉及到地理学本身。在地理学体系中进一步形成了两个亚系——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而且经济地理学还和历史学（主要是近代史）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它们之所以有这种联系，是因为这两门学科曾经属于同一类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自然地理学派从地质学和生物学即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因为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与历史演化根本不同。但是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对事物起源演化的研究有必要无论是在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还是在地理学某些部门与历史学之间均“架设桥梁”。可是，不能不考虑康德学说的方法论及其对空间时间的划分给发展上述学科之间的创造性协作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经济地理学家常常把历史地理学中的事实看作帮助他们认识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形成过程的辅助材料。而历史地理学概论则被编入了经济地理学专题学术著作和教学参考书。И.А.维特韦尔的著作《外国经济地理学中的历史地理概论》（莫斯科，1963），即属此例。

根据П.В.吉列维奇和Д.М.平亨松的意见：“历史上生产力在空间分布的趋势、规律和问题，人口、生产和劳动的地域分工，经济区系及其联络系统的现代分布所形成的连续过程，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对象”。<sup>[40]</sup>

Д.М.平亨松在1975年发表的著作中强调指出：“研究同过去时代的具体历史环境相联系的生产空间结构所形成的连续过程，生产分布的基本规律和问题”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任务。<sup>[41]</sup>作者

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把自己的“痕迹”遗留在了区域经济结构中。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显示出了分析经济地理对象的历代性方法。关于这一点，B.B.安年科夫写得特别明确。他曾运用结构遗传的观点来解释塞内加尔经济地理的特点。<sup>(42)</sup> 通过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历史经济地理著作所作的比较，可发现许多观点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时间的横断面，而地理学家则力图分析现代经济地理学对象的历史。遗憾的是，这些著作远不能经常地衔接起来。在这方面，不妨回顾一下Л. Е. 约法的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极力主张在现代地理学中采取时间顺序的观点，而且主要利用了经济地理的例证。<sup>(43)</sup>

以往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联的。因此，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经济地理的发展过程是片面的。经济地理学家在研究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问题时，很少有所前进，这不是偶然的。

自然地理学家曾经努力研究而且至今仍在研究自然环境发展的自然过程。

А. Г. 伊萨钦科在其详细的综合报告中叙述了十月革命前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sup>(44)</sup> 在这里，他主要注意到与整个地理综合体的进化相联系的自然环境各组成部分的发展问题的原则性方面。А. И. 克拉斯诺夫（1893、1894）、И. М. 克拉舍宁尼科夫（1923、1927、1939）、A. H. 波诺马廖夫（1937）把地形，Л. С. 贝格（1911、1913、1947）把气候，И. К. 帕乔斯基（1891、1915、1917），В. Р. 威廉斯（1914）、В. Н. 苏卡乔夫（1924）、Б. Н. 戈罗德科夫（1946）把植物，Г. Н. 维索茨基（1906）和А. А. 罗杰把土壤看作是景观发展的动力。А. А. 格里戈里耶夫和Б. Б. 波雷诺夫认为气候和地形的相互作用是决定自然环境进化的基本因素。А. Г. 伊萨钦科正确地强调，“任何一个景观要素的发育与整个综合体的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景观要素是“作为地理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发育，而地理综合体又是作为统一的物质体系发育的。”<sup>(45)</sup>

Φ. H. 米尔科夫划分出了四种“景观综合体发育的主要根源：气候的、地质结构的、生物的和人类活动的根源。”<sup>(46)</sup>

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自然环境（新构造、气候、水圈、土壤、植物界和动物界、生物群落等）在历史时期，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段比较短的时期（在某些地区大约一万年）所发生的自然历史变化。<sup>(47)</sup> 我们时常忽略人是许多自然变化，如涅瓦河的形成、西北地区及其他地区湖面的显著升降，以及在景观结构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见证者。但是，在过去人并不是消极的旁观者，而是根据自己的技术力量积极地改造了自然环境。

因此，在自然地理学家看来，历史地理学是研究自然界发展的最近阶段（人类出现之后）的科学。

现代自然地理学创始人之一B. B. 多库恰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景观的复原问题。在《我国草原的过去和现在》（1892）和《俄国的黑钙土》（1883）这两部经典著作中，就有对俄罗斯平原自然条件进行区域分析的范例，且研究了这一地区南部现代和史前森林与草原分布的原因。B. B. 多库恰耶夫强调指出，在着手“复原森林面积”之前，“必须对现代森林作出精确而科学的鉴定。”在这里，他运用了分析古代残留植物的分类方法：

“为了了解森林草原自身的性质，应该注意位于干燥无水的平原中间的草原森林，必须研究那里的植物生活的条件，然后努力复原古代的，譬如说恰恰就是这些森林分布的天然区域，就象后面我们将要对波尔塔瓦省所作的那样。”<sup>(48)</sup> 多库恰耶夫还运用这一方法复原了过去草原所占有的地域。为此，他详细地研究了羽茅属栖息的地势，并且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羽茅属呈岛屿状的现代分布状况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它几乎全部占满了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地区（指的是下哥罗德省<sup>①</sup>的谢尔加奇县——本书作者），当然，除了针叶林区以外。”<sup>(49)</sup> B. B. 多库恰耶夫在复原古代景观的时

① 1936年12月，改建为高尔基省。——译者

候，根据森林土的分布判断出过去森林的分布；同时，他还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例如，他在谈到有史时期草原地带气候变迁的时候，依据编年史材料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阿斯科尔德和基尔时期（869），同样也在更晚得多的时期，即查坡·洛·什·赛切时期，<sup>①</sup> 俄罗斯人的船只为了通过第聂伯河石滩（特别是涅亚瑟特石滩），或者全部卸下货物，或者直接由陆路搬运”。这位学者还进一步作出概括性的结论：“因而，根据我们的编年史家证实，大约一千年以前，森林区和草原区的边界大体上通过现在所通过的地方（巴尔索夫、迈科夫等）。”<sup>〔50〕</sup> 历史资料还被用来复原草原动物区系。B.B.多库恰耶夫在研究米舍尔地区<sup>〔51〕</sup> 土壤的时候，注意到了在某些地方（奥卡河两岸风积沙丘中）“大量”“石人和青铜人的”残片；他以此为根据，得出了这一地区早在古代即已开发的结论。<sup>〔52〕</sup> 在研究旧拉多加城堡的墙基上形成的土壤时，他又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材料：原来，这里形成的肥沃土壤已经有了700年的历史。<sup>〔53〕</sup>

因此，B.B.多库恰耶夫无论是复原古代景观，还是鉴定自然过程的速度，都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尽管他没有直接谈到历史地理学，但他非常了解这个学科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巴尔索夫、迈科夫），并且以自然地理学的内容丰富了历史地理学。

杰出的俄罗斯学者A.I.沃耶伊科夫的一系列著作则论述了人对自然的作用问题。尽管他也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当前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但是地理环境和人口在其活跃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也占有适当的地位。他在给同时代的人指出不合理地利用自然会招致有害的后果的同时，还运用历史遗传学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这方面，有关土耳其斯坦、外高加索地区发展人工灌溉的资料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些地区，“与两千

〔1〕 16—18世纪犯罪或逃亡的哥萨克人在查坡·洛·什地方擅自组织自以为独立的组织。——译者

〔2〕 伏尔加河中游地带少数民族米舍尔亚克人聚居的地区。——译者

年前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灌溉土地要少得多。而阿姆河和锡尔河<sup>①</sup>的水大概从来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过。”<sup>(53)</sup> A. И. 沃耶伊科夫在谈到俄罗斯实行灌溉的重要性时，运用了在埃及、印度和其他国家发展灌溉农业的历史资料。在被Л. С. 贝格称作“最漂亮的世界地理学文献”《从地理学和气候学观点出发看里海东岸地区的灌溉》中，历史资料则被用于解答中亚气候的变迁问题。

Д. Н. 阿努钦不仅是最著名的地理学家，而且还是人类学家、民族志学家、科学史学家。他的著作《以不断发育的观点认识俄罗斯欧洲的地表形态》(1895)是最出色的地理学史方面的专著之一，直到现在也未失去其科学价值。他把地理学划分为普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之后强调指出，从在人的影响下自然界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来看，研究区域性是区域地理学的最终任务。在《地理教学及有关问题》一文中他特别指出，尽管“描述应该注意到所谈到的那一时刻，但必须记住，地球表面经历着经常的变化，现在见到和存在的事物是当代和在此以前的地质时代逐步形成的各种自然条件叠加的结果。因此，对一个地区地表形态、景观和生命现象的应有了解只有通过调查它的过去并研究造成连续变化的过程才能做到。”<sup>(54)</sup>

在十月革命前，许多学者就曾强调过人的经济活动在改变自然环境中的作用。例如，И. 帕林普谢斯托夫(1890)、А. 戈尔佳金(1900)、В. И. 塔利耶夫(1905)认为俄罗斯平原的森林草原景观是由于人们砍伐(烧掉)森林造成的。<sup>(55)</sup> И. 帕林普谢斯托夫认为森林被砍伐之后，森林土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这是自古以来人对自然界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森林草原景观的起源、河流变浅、森林面积变化这些问题在十月革命前即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并且促进了历史自然地理学方法的发展。

现代景观学的创始人之一，Л. С. 贝格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广泛利用了历史文献资料。他在专题学术著作《气候和生命》(莫斯

① 分别在苏联的中亚和中亚细亚地区。——译者